

報紙閱讀與晚清讀書人 「國家」意識的形成

• 卞冬磊

摘要：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兼具了從「天下」到「國家」的縮變和從「地方」到「世界」的擴張。這些空間概念同時也是政治概念。本文通過分析晚清內地鄉紳劉大鵬的日記，試圖揭示報紙閱讀這一日常生活的實踐，如何使普通人超越「鄉里空間」和對「天下」想像式、道德化的體認，而進入到國家空間的具體事務之中，建立「國家」圖像。本文最後提出，這一建立於具體事務基礎上的「知有國家」，是晚清讀書人超越傳統「文化國家」、形成近代「政治國家」（即如何組成國家，如何安排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意識的關鍵環節。

關鍵詞：現代報刊 劉大鵬 國家意識 天下 民族國家

一 導言：閱讀報紙與「國家」意識

1899年除夕之夜，梁啟超搭乘的輪船正在太平洋上航行，其時「人靜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他驀然想起自己身處的時空，「乃新舊二世紀之界限，東西兩半球之中央」^①。與傳統的「朝代」、「天下」相比，「世紀」與「半球」這一對「現代」時空觀念，並非他一時頓悟之產物，而是建立於對世界秩序的理性認知。

近代中國思想史已經揭示，傳統中國人的空間觀念，其遠端缺乏清晰的邊界，其近處則囿於耳聞目見，常常處於「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與「知有地方而不知有國家」的兩極狀態，即如梁啟超之觀察^②：

中國數千年的教義習慣，由國家等而下之，則地方思想、宗族思想、個人思想甚為發達焉，而國家等而上之，則世界思想甚為發達焉。唯獨處於中

* 本文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閱讀公眾的興起：晚清報刊閱讀史研究(1894-1911)」(專案編號：13YJC860003)的研究成果。

間之一階級曰國家者，則對其性質若未甚了解，於其設施若不得途徑，以故發育濡滯，而至今未能形成。

梁啟超所指的「地方」、「國家」和「世界」，雖是政治概念，卻也一一對應着人們對地理空間的認知。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曾說，「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縮變 (contracting) 為『國家』的過程」^③，這一「縮變」，迫使近代中國人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和社會秩序。而在另外一端，中國人也有一個空間認知逐步「擴大」的過程，亦如梁啟超從「桃源中人」、「國人」到「世界人」的自我建構^④：

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

大部分晚清讀書人不大可能僅依靠個別思想家的理論詮釋，就可以領悟「世界」、「天下」、「國家」、「地方」之間的複雜關係。近代國家意識的養成，多半伴隨着空間認知的「擴大」和「縮變」。

無論是「世界主義」或「地方主義」，近代中國眾聲喧嘩的概念、文化和政治主潮最終落到它們的中間環節——「民族國家」，而1895年常被追溯為「中國」進入「世界」秩序的起點，人們的地理及政治觀念相應轉型。法國學者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說，直到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才象徵「中國人的效忠對象不再限於某個團體和地區，從此也包括國家」^⑤。

梁啟超的「現代」時空觀，來源於他卓爾不群的個人生涯：戲劇性的逃亡、廣泛的遊歷、孜孜不倦的閱讀。相較而言，大部分晚清讀書人的經歷都「黯然失色」，也不大可能僅依靠個別思想家的理論詮釋，就可以領悟「世界」、「天下」、「國家」、「地方」之間的複雜關係。換言之，近代國家意識的養成，多半伴隨着空間認知的「擴大」和「縮變」，需要日積月累的具體學習才能緩慢形成。

那麼，在普通讀書人的內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裏，他們如何可以超越「地方」和「天下」意識，逐步建立起對「國家」的具體認知呢？本文即以晚清鄉紳劉大鵬 (1857-1942) 的《退想齋日記》^⑥ (下引只註頁碼，涉及日期均為農曆) 為史料，試圖展現報紙這一「新」媒介如何使「超越」成為可能。一生平凡無奇的劉大鵬，其《退想齋日記》記錄1890到1942年間的世事變化，特別展現出「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以京師和通商口岸及其影響輻射區為一方，以廣大的內地為另一方」——的差異；這兩個世界的變化，「或者不同時，或者不同義」。身處內陸的劉大鵬之生活狀態，或更接近一般讀書人理解世界的方式^⑦。

儘管美國人類學家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早已揭示，報刊與小說等構成的印刷媒介，使互相連接的「讀者同胞們」，「形成了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的胚胎」^⑧，不過，他以及後來的研究者甚少揭示民族意識在人們腦海裏形成的動態過程。而且，本文發現報刊與小說在建構民族國家意識時，其功能並不同，兩者在媒介形態以及各自規範的知識形態上涇渭分明，即如塔爾德 (Gabriel Tarde) 所說，「雖然書籍使操同一語言的讀書人都感覺到同一的語文身份，但是它們並不關心當前令人興奮的問題。」^⑨換言之，隸屬書籍的小說缺乏時效，

雖能創造身份的共同感，但缺乏報紙對國家現實的報導；何況晚清讀書人所面對的小說仍舊以「才子佳人」為主^⑩。

報紙是一種現代事物，頻繁地把讀者的視線引向遠方的現實事務。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引用1892年一位評論家的話說，由於現代報紙的作用，某個邊遠鄉村的居民對當時所發生事件的知曉程度，超過了一百年前的首相。閱讀某份報紙的村民「自己就同時關心着發生在智利的革命、東非的叢林戰爭、中國北方的屠殺和發生在俄國的饑荒」。吉登斯指出，「如果不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新聞』所傳達的共享知識的話，現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擴張本來是不可能的。」^⑪他所說的「全球性擴張」，當然是現代性發展到相當程度的判斷，而本文要進入的則是現代意識剛剛萌發的晚清讀書人的頭腦。

二 從「地方」到「天下」：劉大鵬的空間認知

劉大鵬1857年出生於山西省太原縣晉祠鎮赤橋村，1894年中舉，一生的活動重心圍繞在家鄉周圍。「儒者在下則美俗」，從他的日記中可見，他不負自己的使命，特別關注地方風俗、物價漲幅和科舉考試等事宜^⑫。

在劉大鵬的日記中，關於「村」的描述較少，一方面因為這一空間的活動本身缺乏記錄價值——如「去鄰村而訪友」(頁15)，另一方面也因為「村」尚構不成身份認同的文化單位，僅僅代表個體活動的地理空間。

比「村」高一層的空間單位中，「晉祠」是一個具有實體意義的空間，它是日記裏常常提及的「社會空間」，僅以1893年幾則記載為例：

七月初四日：余去晉祠遊，見一雜貨攤上售一部《三國志》，愛不釋手，遂用三百廿錢買之，如獲至寶一般……。(頁22)

九月十二日：今日晉祠等村莊抬擱、家家戶戶皆設酒飯待親戚朋友。(頁23)

十月二十二日：申刻，到晉祠辦事，見廟門前街上張掛撫憲告示一張，乃禁民種粟花不許過二畝，過則必使除去，更種禾稼。(頁25)

點滴的記錄，和盤托出一個多功能的社會空間：「晉祠」首先是一個鄉鎮級別的商業集市，它可能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筆下的華北平原上的一種「初級集市」，吸引着附近幾個村莊的農民^⑬；同時，它也是一個遊玩看戲和舉辦地方慶典的地方，逢節日多有戲劇上演和儀式舉行；此外，它還是地方官員發布榜文之處。榜文這種官方資訊，向來選取人流密集之處發布，「市鎮」乃首選之地^⑭。

與「晉祠」這個實體空間相比，「鄉」、「里」、「邑」這三個單位較為抽象，但卻更頻繁地出現於日記中，其指涉的地理範圍大於「鎮」而略小於「縣」。不過，劉大鵬很少在地理意義上使用它們，原因在於這三個詞具有濃厚的文化意義，構成了他觀察地方風俗的基本單位。日記中「近來吾鄉風氣大壞」(頁17)、「吾里人民，皆資造紙為生」(頁46)、「近日吾邑加酒稅、煙稅，他邑亦如」(頁57)之類的陳述，俯拾皆是。在這些地理單位前加上「吾」字，顯示出他的身份定位，既不在狹小的「村」落，也不在更高層級的行政區域，而在「鄉里空間」之中^⑮。

「鄉」、「里」、「邑」這三個單位較為抽象，但卻更頻繁地出現於劉大鵬的日記中，其指涉的地理範圍大於「鎮」而略小於「縣」。不過，劉大鵬很少在地理意義上使用它們，原因在於這三個詞具有濃厚的文化意義，構成了他觀察地方風俗的基本單位。

而「縣」則兼具行政和地理意味，缺乏文化意義。劉大鵬常以客觀口吻，記錄「縣」一級發生的具體事務。首先，他的行動的空間會延伸到太原縣城，如「適縣城拜年」之類(頁37)。其次，對於鄰縣的情況，他也還算熟悉，日記中既有「今秋收成，除祁縣、太谷、平遙、介休三、二成外，率皆豐收」(頁102)之類的一般社會狀況的描述，也不乏具體事務的記錄，如1896年八月初九日所記：

又聞近日甚多，太谷西關明火一生意家。祁縣界搶奪一行路車夫銀五百兩。陽邑鎮明火一土店，被店中掌櫃殺賊兩個，其餘將賊屍搶去，且劫四包土。榆次東陽七月間明火一土店。平遙縣明火一戶家，不僅劫物，而且姦淫婦女，可謂惡之極也。(頁61)

在上述引文中，「太谷」、「祁縣」、「榆次」、「平遙」等均為山西境內的行政縣，與劉所在的太原縣平級。因此，在「縣」的層面，他依靠耳聞目見尚能確切知曉一些發生在鄰縣的社會事件。另外，「縣」還是他的主要消息來源，扮演著連接外部世界的中介角色，如「昨去縣拜年。親朋皆言：遼東軍務吃緊，臘月下旬又從徐溝、榆次過了許多兵」(頁37)。這種聞見在日記裏也頗為平常。

「縣」的上一層是「省」。但「省」這一空間的事務，已全然超出劉大鵬的親身經歷。對於「省」的認知，他大半只能依靠「道聽塗說」了，如「里人自省歸，言：省中銀錢甚缺、生意之家並不能周行」(頁52)、「有人從省來言：軍務吃緊」(頁35)之類。經過漫長的時空過濾，此類消息多半模糊不清，如189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記：

所到之處，人皆言晉省設招商局、開官錢鋪大不便於民，此二宗業已為之矣。至於修鐵路、開礦務，謠之甚緊，無論士農工商，皆言其不便。但未知真有之乎，抑係謠言乎。閭巷之間，議論騰沸，殊不可以入耳也。(頁66)

至於「省外」所發生的事件，就更為遙遠而陌生了。由於參加科考，劉大鵬曾去過京師兩回。1895年第一次會試時，北京給他留下「人才薈萃」、「奢侈極矣」、「最講虛體面」的印象(頁40、41、42)；1898年第二次會試後，他與同伴乘火車赴天津一遊，此行可謂不虛——「天津一遊前後六日，雖未知道之所在，而淺陋耳目頗覺較前擴充矣。」(頁83-84)然而，出遊異域的機會畢竟較少，中華帝國的疆土廣袤無垠，任何人(包括梁啟超)也無法全然通過親身經歷來感知天下。在劉大鵬的生活世界裏，「省」以外空間發生的事件，遠遠少於「鄉里空間」，為數不多的消息主要靠以下兩種方式遠道而來：

第一種是「流言網絡」。正如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所說，「密集的商业網絡在十八世紀的全景中佔有重要地位，並幾乎使每個人都同某一市場有固定的關係。關於各種地區性與全國性事件的消息見聞，也沿着連接各個村莊與各個市鎮的商路，隨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傳開去。」^①「流言網絡」是劉大鵬獲取「省外」消息最倚重的手段。如1896年四月初九日的日記中記錄了各省維新事宜：「近聞各省有開礦、開鐵路之說，草野閭巷，聚訟紛如，人心慌慌，不知措置，殊令人詫異」(頁57)；1897年六月初四日，則記載了一條類似乾隆朝「叫魂」的社會傳聞：「武

在劉大鵬的生活世界裏，「省」以外空間發生的事件，遠遠少於「鄉里空間」，為數不多的消息主要靠「流言網絡」和私人書信而來。劉建立起來的「省外」空間認知可謂殘缺不全，但這個空間的見聞或知識是形成「國家」意識的關鍵所在。

肆三來言其近聞天津、京師有人將十餘歲童子用手一撫，該童即昏迷不醒，竟從惡匪而去。」(頁73)

第二種是私人書信。中國讀書人以信件互通有無、切磋學問，殊為平常。1896年四月二十七日，劉大鵬接到朋友來信，卻多有語焉不詳之處：「風聞有意全裁各省書院，停鄉、會試十科，新立同文館、博致書院，請洋工師主教，外省現有如此辦者。開礦務、修鐵路，外省已請洋人辦理。」(頁28)不過，他似乎並無多少讀書人朋友，靠信件獲知消息屬偶然為之。

由上可見，基於零散的「省外」見聞或知識，劉大鵬建立起來的「省外」空間認知可謂殘缺不全，他能夠依靠的消息來源有限，內容也含糊不清，因而無法獲知「國家」空間的具體運作，就如溝口雄三對辛亥革命之「省獨立」形態的觀察：「『鄉里空間』因為只止於省的層面，因而缺乏新的國家構想去代替王朝」^⑩，乃是因為「省外」空間的見聞或知識是形成「國家」意識的關鍵所在，而這個層面的事務，常常牽涉「國家／社會」這個主體。

不過，對「省外」空間認知的狹小，並未妨礙劉大鵬對「天下」一詞的使用。對他來說，雖然功名不高，亦無官職，但「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卻好像是與生俱來。常常在節日時分，他會產生「天下一體」的感覺，日記中屢見「天下之人皆設肴酌酒慶賀佳節」(頁20)、「千村萬井率皆慶賀」(頁33)之類的话。此外，1897年二月二十一日還有以下記錄：

天地之間，原是一個利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求利為事。以義為利者，則天下國家長久而治；以利為利，則天下國家必將傾覆。華夷通商，是天下一大變局，論者歸咎於執事，而不必也。夫天下大變，原屬天意使然，豈人力所能維持。(頁71)

這裏「天下」出現的頻率不少，且與「國家」並用，但是我們卻發現劉對「天下國家」的論述，要麼抽象得毫無內容，要麼只屬於道德話語。換言之，他實際上並沒有渠道去認知具體的「天下國家」在發生着甚麼事，而只能付諸想像。

至此，我們已經層層分析了劉大鵬的空間感：得益於耳聞目見，他對「縣」以下地理空間中發生的事件較為熟知，其身份和文化認同均定位於「鄉里空間」；而「省」、「省外」、「國家」層面發生的事件，則主要依靠「流言網絡」來認知，不過由於來自這一網絡的消息既零散模糊，又偶然無序，他根本沒有能力建立一幅外部世界的清晰圖像。至於在「天下」層面，他的論述只不過是一種抽象的道德話語或邏輯推演，不包括任何具體事務。顯然，這種抽象描繪無助於人們擺脫根深蒂固的「地方認同」，更遑論向現代「民族國家」意識邁進。

劉大鵬對「天下國家」的論述，要麼抽象得毫無內容，要麼只屬於道德話語。他實際上並沒有渠道去認知具體的「天下國家」在發生着甚麼事，而只能付諸想像。這種抽象描繪無助於人們擺脫根深蒂固的「地方認同」，更遑論向現代「民族國家」意識邁進。

三 超越「行動的空間」

德國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曾說，原始人的空間是一種「行動的空間」，集中於直接的實際利益和實際需要，而從「行動的空間」上升到「抽象空間」時，需要借助複雜的思維過程^⑪：

人並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個非常複雜和艱難的思維過程，才獲得了抽象空間的概念——正是這種觀念，不僅為人開闢了通向一個新的知識領域的道路，而且開闢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個全新方向。

引用此語，並不是要將劉大鵬的空間感定位在原始水平。事實上，作為一個舉人和地方塾師，他自然閱讀過大量的儒家典籍；而「閱讀」正是卡西爾所說的「複雜和艱難思維過程」的重要活動，這一點在庫利 (Charles H. Cooley) 那裏亦有相關論述¹⁹：

如果他想反抗逐漸狹小的環境，他必須通過書本、個人交往和想像，保持和更廣大的世界的聯繫。……我們對於國際關係和我們不同的種族，以及我們自己所屬的階級以外的其他社會和工業階級的道德感情的產生，若沒有廉價的印刷業和快速的交通工具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直到1902年，劉大鵬的「符號空間」裏終於浮現出「國家」的具形身影。其時，省「洋務局」撥款創辦《晉報》。在1902至1906年間，《晉報》是劉大鵬主要閱讀的報紙，儘管他留下的記錄極為簡陋，但我們還是能從中窺探出他對世界的認知變化。

因此，在劉大鵬身上，自然不只填充着耳聞目見式的「行動的空間」，亦不會缺少「符號空間」。不知何故，他很少像其他晚清讀書人那樣記錄讀書心得，我們只能從他的治學態度間接推測他的閱讀世界。1893年三月十八日，他寫到：「當今之世，士風甚壞，平日用功所讀者，固是時文，所閱者無非制藝，而於經史子集不問者甚多，所以士林之內多浮文而少實行，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諸端，亦皆不講。」(頁20)

類似的議論星羅棋布地散落在日記裏。由於晉祠「傍官道，人多經商，少務農，加以有豐富的稻草為原料，造紙業相當發達，形成重商輕學的鄉風」²⁰，作為一名讀書人，劉大鵬對此頗感失望。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儒家正統學問以及道德倫理有着深深的眷戀。儒家經典以經學為主，「由掛在孔子名下的『五經』，或顯示孔孟之道的『四書』，以及本派大師對它們的權威詮釋」構成²¹，掌握這些知識是讀書人的基本教養。不過這些經典及其詮釋缺乏關懷現實的性格，它所創造的「符號空間」，主要是學術知識，沉浸其中，不僅不會增加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反而會造成「思想與現實的斷裂」²²。1896年以後，劉大鵬購得一些經世之書，如《皇朝經世文編》之類，作為科舉考試的「枕中秘鴻」。不過，他所留下的閱讀心得多與前朝奏章有關，而與正在發生的「國家」事務無涉。

四 報刊與國家現實的建構

直到1902年，劉大鵬的「符號空間」裏終於浮現出「國家」的具形身影。其時，清廷實行「新政」，辦報成為地方官政績之一種。1902年正月，省「洋務局」撥款創辦《晉報》——「山西最早的近代報紙」，其內容包括「書刊」、「糧價」、「銀價」等廣告，以及本省新聞、上諭、電報、京省新聞、各國新聞、京報選錄等。在1902至1906年間，《晉報》是劉大鵬主要閱讀的報紙，儘管他留下的記錄極為簡陋，但我們還是能從中窺探出他對世界的認知變化²³。1902年八月十七日，劉大鵬第一次接觸《晉報》：

近日省城設晉報局，仿照上海、天津申報之法。東家送來一報，有瘟疫盛行各直省，設江蘇鎮府一處，數日即斃四五千人，其餘閩、粵、楚、滇、黔等省，莫不瘟疫盛行，斃亡多人，天災如是。(頁114)

這則日記具有特別的象徵意義。與過往的「道聽塗說」相比，報刊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建立於具體事務基礎上的「國家」圖像。若是往常，對於這樣遙遠且捉摸不到的事件，他要麼無從知曉，要麼就只能靠道聽塗說，不大可能確切了解瘟疫的擴展程度，多半又要處於「人心慌慌」的狀態。現在，由江蘇、閩、粵、楚、滇、黔等「省外」空間構成的「國家」層面的事件，以白紙黑字的形式清晰地表達出來，這個空間便不再抽象地毫無內容。這一嶄新的體驗，至少在日記裏是第一次展現。

如潘光哲引用一名法國革命派新聞工作者的話，指出「與書本不同，報紙不是被動地等待讀者去尋覓它們，而是主動地去逼近讀者」，報紙「按期送到讀者手上，而且總是帶來一些引人興味的新東西」²⁹。與國家現實有關的報導日積月累，如「教案遍中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頁117)、「東三省於前月九日被俄人佔據」(頁130)，以及全國各地「『新政』之不善」(頁128)等事件，便相繼進入劉大鵬的視野，像1903年九月二十一日日的記錄，在日記中並不鮮見：

閱晉報，俄夷於黑龍江建立都城，意在都於此而吞併中國也。中國政府仍瞶瞶不知……廣東潮州、嘉應有匪猖獗，勢甚洶洶，與桂匪相通，湖南亦戒嚴，浙江亦有匪亂，天下殆無一處安者矣。桂匪有夷協助軍餉，故不能平，外夷立意，吞我境土，顯用欺罔之法隱行鴆毒之心，將一切官員戲弄於股掌之上，殊令人扼腕。(頁129-30)

這一段讀後感主要涉及國內事務，從黑龍江、廣州、桂林、湖南到浙江，每一個地理空間都對應着具體的事務，顯示出劉大鵬心理空間的橫向擴展。此處，「天下殆無一處安者」的「天下」和過去「千村萬井皆率慶賀」式的「天下」已不可同日而語。

而在另外一端，有關「外夷」蠶食中國各地的消息頻繁出現，又使列文森所說的「縮變」成為可能。1903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劉大鵬寫到：

光緒二十六年，俄夷乘亂入東三省，據為己有。二十七年和議成，俄約退出，迄今仍虎踞不退。……此時外洋各國視中國為一塊肉，均欲吞而食之。現在法夷蠶食雲南廣西，英夷蠶食廣東福建，日本蠶食閩浙，德夷蠶食山東，俄夷蠶食新疆蒙古，其為中國之患者俄夷為最，以其地與中國毗連耳。(頁125)

在二十世紀初，像這樣的「帝國主義」威脅話語普遍流行於報刊，強化了人們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對待的意識。儘管那時的讀書人並不用「民族國家」一詞來對詮釋自己對社會的想像，但他們已或多或少感受到「國家」實體所受到的威脅，羅志田準確地捕捉了這一現象³⁰：

在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威脅話語普遍流行於報刊，強化了人們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對待的意識。儘管那時的讀書人並不用「民族國家」一詞來對詮釋自己對社會的想像，但他們已或多或少感受到「國家」實體所受到的威脅。

儘管愈來愈多的人逐漸體會到中西競爭的文化含義，感覺到亡天下的危險，但他們同樣明確意識到是其所屬的政治實體受到了威脅，恐怕沒有多少人在意識層面感覺到僅僅是其所從屬的「文明」受到侵犯。

以上，我們基於劉大鵬的「行動的空間」，將他定位在「地方讀書人」的角色上。對他來說，「閱讀」是拓展「符號空間」的最好方式。作為傳統讀書人，閱讀儒家典籍和經世之書並未為他增加「符號空間」裏的「現實感」，相反，是現代報刊——其刊登的知識大抵有一種指涉現在、關注現實的傾向，擴展了他對國家事務的認知。當我們考慮到「鄉里空間」的資訊閉塞，以及傳統讀書人濃厚的地方意識時，這種通過報刊而與國家事務建立起來的「交往」關係，就富含了「現代」意義。

由於人的注意力具有「零和」的特性，因此在劉大鵬的視野裏「國家」與「地方」的此消彼長便不足為奇。誠如齊美爾 (Georg Simmel) 所說，「使與最親近的人的結合的紐帶變得鬆懈，但是對此的補償是編織一條新的——實現的和理想的——同遠處的人相結合的紐帶。」^{②⑥}在劉這裏，即是從「地方社會」的俗事中抽身打量起「民族國家」，這可能使他產生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或如歐洲中世紀末的閱讀公眾那般^{②⑦}：

即使地方紐帶鬆弛了，與更大集體的紐帶卻在鍛造當中。印刷材料促使靜默讀者對事業的忠誠，這種事業的宣導者不見於任何一個地區，他們從遠方對無形的公眾講話。新的群體身份形式開始了與原有的、比較地方化的忠誠者的紐帶展開了競爭。

五 從「知有國家」起

1898年春，經學大師皮錫瑞和兒子皮嘉佑一起創作了一篇《醒世歌》，刊登在《湘報》上。其中有幾句專門涉及地理觀念的內容：「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旁。」^{②⑧}這四句話顯示了中國人地理認知的現代性。但光靠這種知識的詮釋，恐怕支撐不起人們對現代國家的認知。羅志田曾說，「效忠國家的前提是知有國家，全國性的思慮與見聞和知識，與之有着直接的關聯。」^{②⑨}換言之，讀書人要從「地方」或「天下」中走出來，完成「縮變」和「擴張」，必須建立在對國家事務的確切理解之基礎上。

「報刊有助於擴充全國性的思慮」，就如張之洞《勸學篇》中「閱報」一節所說，「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不過，羅志田之所以如此表述，只是為了引出相反的觀點，即「身為天下士，而不知有『國家』，頗近似於癡人說夢。故以天下為己任者，自不待報紙提倡仍日以『神州』為關注對象也」^{③①}。葛兆光亦曾表達過相似的觀點，他說，「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經由常識化、制度化和風俗化，逐漸從中心到邊緣，從城市到鄉村，從上層到下層擴展，並「至少在宋代起，已經漸漸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實際的，而不是『想像的』」^{③②}。

兩位歷史學家的話，各自有其闡述的語境，但這裏卻涉及到一個「抽象國家」和「具體國家」，或者說「文化國家」和「政治國家」的區別。讀書人以天下為己

作為傳統讀書人，閱讀儒家典籍和經世之書並未為劉大鵬增加「符號空間」裏的「現實感」，相反，現代報刊指涉現在、關注現實的傾向，擴展了他對國家事務的認知。從「地方社會」的俗事中抽身打量起「民族國家」，這可能使他產生一種新的身份認同。

任，自然有關注「神州」的胸懷，也知道「天下」存在一個實際的「中國」，就如山西鄉間的劉大鵬一樣，每逢節日他便會想像一個「千村萬井」的畫面。可是，以本文的觀察而言，劉大鵬雖能意識到「天下國家」的實際存在，但起初根本沒有途徑知道「天下國家」的實際事務，他的「國家」觀念只具有抽象的、文化和道德上的意義，這和近代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意識相距甚遠。

事實上，在宋代就顯現的「中國」意識，以及在現代報刊出現之前就有「神州」關懷，在文化的意義上自然是成立的。不過，正如林同奇所說，當我們從政治上理解「民族國家」時，「宋代的中國已出現近代民族國家之說實在難以成立」^②，乃是因為「民族國家」除了有「對外」的文化意義之外，還必須「對內」向它的國民顯現「主權在國家內部的運作」。當然，對劉大鵬而言，「知有國家」——對國家內部運作的感知，離「民族國家」的主權展現還十分遙遠，但「知有國家」卻是形成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意識之準備，至少在「知」的層面上與傳統偏向文化和道德的、只具有抽象意義的「國家」區分開來。這時，無論「中國」、「神州」是實際還是想像，已變得「言之有物」。

普瑞得 (Allan Pred) 曾指出，一個抽象的「空間」，「經由意向、觀念及符號等意義的給予」，可以轉換成「一個動人的、有感情所附着的焦點，一個令人感到充滿意義的地方」^③。報紙對國家事務的不斷報導，正是劉大鵬這樣的讀書人超越「住居和經常性的活動」、使原本抽象的「天下國家」充滿「真實的經驗」的主要方式。王鴻泰曾指出，在明代中國，即有「公眾社會」的存在。讀書人通過閱讀官方出版的邸報，使對「朝廷或天下關懷，不只是一種情感性的懸念，而是日常生活間透過具體事務的理性知解所產生的參與感和一體感」^④。此一觀察不虛，但須知邸報內容僅以「朝廷」為主體，甚少涉及近代「國家」包含的「社會」；且在帝國政治系統內部發行，讀者限於官員和上層紳士。像劉大鵬這樣的地方讀書人，是通過現代報刊而非邸報，超越耳聞目見的「行動的空間」和儒家典籍建構的「符號空間」，得以知悉國家層面的具體事務。而「知有國家」，正是「如何組成國家，如何安排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等涉及政治生活的問題」，「被重新提到議事日程」^⑤的前提。

劉大鵬雖能意識到「天下國家」的實際存在，但起初根本沒有途徑知道「天下國家」的實際事務，他的「國家」觀念只具有抽象的、文化和道德上的意義，這和近代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意識相距甚遠，但「知有國家」卻是形成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意識之準備。

註釋

-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25。
- ② 梁啟超：〈中國立國大方針〉，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39。
- ③ 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57。
- ④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85。
- ⑤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ed. Mary C. Wri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52. 此一參考文獻受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一書提示。
- ⑥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⑦ 葛小佳、羅志田：〈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世事變遷〉，載《東風與西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45、55。
- ⑧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43。
- ⑨ 塔爾德(Gabriel Tarde)著，何道寬譯：《傳播與社會影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237。
- ⑩ 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12。
- ⑪ 參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頁67-68。
- ⑫ 劉大鵬的生平與經歷，參見行龍：〈懷才不遇：內地鄉紳劉大鵬的生活軌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69-80。
- ⑬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3。
- ⑭ 連啟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訊息傳播與社會互動》（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153。
- ⑮⑯ 參見溝口雄三著，林少陽譯：〈辛亥革命新論〉，載陳光興、孫歌、劉雅芳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0），頁110；129。
- ⑰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頁42。
- ⑱ 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甘陽譯：《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頁56。
- ⑲ 庫利(Charles H. Cooley)著，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頁45、255。
- ⑳ 行龍：〈懷才不遇〉，頁71。
- ㉑ 朱維錚：《求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5。
- ㉒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頁4。
- ㉓ 楊海山、霍軍：〈山西最早的報紙——晉報〉，《山西文史資料》，1992年第5輯，頁156。
- ㉔ 參見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72。
- ㉕㉖㉗ 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頁40；38；38。
- ㉘ 齊美爾(Georg Simmel)著，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4。
- ㉙ 愛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著，何道寬譯：《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78-79。
- ㉚ 皮嘉佑：〈醒世歌〉，《湘報》，1898年4月6日。
- ㉛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2。
- ㉜ 林同奇：〈「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雙重含義——從葛兆光的《重建「中國」的歷史論述》談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4月號，頁119。
- ㉝ 普瑞得(Allan Pred)著，許坤榮譯：〈結構化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載夏鑄九、王志弘編：《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9），頁119-20。
- ㉞ 王鴻泰：〈社會的想像與想像的社會——明清的信息傳播與「公眾社會」〉，載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139。
- ㉟ 章清：《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6。